

## 當不可抗力遇上不動體

李逆熵

唸中學時讀過一篇由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所寫的科學散文，當中提到「如果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遇上一個不可移動的物體，將會出現怎樣的結果呢？」

（What if an irresistible force meets an immovable object?）。這是一個「怪論」，因為無論你假設物體是否會被移動，都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 不相容概念導致矛盾

當然，阿西莫夫很快即解釋：這其實是個「假問題」（pseudo-question）。這是因為我們如果假設世界上真的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便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可移動的物體」；相反，如果世上真有「不可移動的物體」，便不可能有甚麼「不可抗拒的力量」。也就是說，「不可抗拒」和「不可移動」是兩個不相容的概念，因此不可能在同一個宇宙中出現。

其實，我國戰國時代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個故事，所說的正是同一個道理，而「矛盾」二字亦正由此而來。

這個道理連小學生也可明白。但可悲的是，在廿一世紀的今天，全世界的決策者都似乎無視於這個基本道理，而繼續不斷地追求違反物理定律的經濟增長。在他們的認識中，「經濟增長」的「硬道理」無疑已經成為了一股「不可抗力」。但他們不肯面對的現實是，這股「不可抗力」正在衝向「大自然的極限」這個「不動體」。

兩者相撞會出現怎樣的後果呢？

不幸的是，這已經不是一個關於「邏輯悖論」的智力遊戲，而是一個關乎億萬人的生計甚至性命的現實問題。的確，同一個世界裡不可能同時存在「不可抗力」和「不動體」。哪麼我們必須要問的是，「經濟增長」這個「不可抗力」和「自然極限」這個「不動體」之間，誰者才是“冒牌貨”呢？

答案當然是前者。

對於習慣以自然科學的方法看待問題的人，這已是問題的終結。然而，「經濟增長」之作為一股「不可抗力」，其背後實有著巨大的「內在邏輯」。如果我們好像某些環保人士一樣，完全無視於這些「內在邏輯」而一味鼓吹「環保」，則很易

會被人批評為「脫離現實」而被嘲笑和忽視，最後於事無補。

## 「不可抗力」的內在邏輯

這些「內在邏輯」是甚麼？在最簡單的層面，經濟增長的反面是經濟衰退，而經濟衰退即表示企業會收縮甚至倒閉，從而導而大量失業。失業的人當然會減縮消費，從而導致市面更為蕭條而企業經營更為困難。另一方面，投資者對經濟失去信心，自然不願作出新的投資。結果是就業問題無法得到改善。投資、生產、營運、就業、消費之間這種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最後會導致經濟崩潰民不遑生…。

精明的你可能會立刻提出異議：相對於「經濟增長」的一個可能性固然是「經濟衰退」，但另一個可能性則是處於「恆穩態」(steady-state)的經濟：亦即經濟規模既不增長也不縮減。而在面對全球生態環境備受破壞的當前，我們為甚麼不可以透過這樣的一種經濟發展（而非「增長」）模式以避免災難的發生呢？

呀！這便把我們帶到「企業競爭」這個重要的題目。

我們都知道，一個自由市場裡的企業競爭是十分殘酷的一回事：所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新的企業鬧哄哄地成立，也有不少企業慘淡地倒閉。但正如經濟學家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所指出，這種由「企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 和「利潤動機」(profit motive) 所推動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正是人類社會和經濟進步的一個重要泉源。

為甚麼這樣說呢？原來由於市場的「供、求」作用，長遠而言，某一商品（或勞務）的價格在企業間的相互競爭之下，很快便會趨於一個頗為劃一的「市場價格」。在這種情況下，要把利潤率提高（這當然是每個做生意的人所追求的目標；而即使不以此為目標，也要防止「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方法只有兩個：一是提供別人所無的商品或服務，也就是開闢全新的市場。至於另一個辦法，便是降低生產成本。前者當然和上述所謂的「社會和經濟進步」直接有關（當然也導致無休止的「人為需求」(manufactured wants) 的膨脹這個社會問題)。而即使是後者，亦會導致技術的不斷革新，因此也是進步的泉源。（其實還有第三個辦法，那便是把市場壟斷或與其他企業勾結以操控市場。但讓我們暫時假設「自由競爭」仍然成立，看看能夠推出甚麼結果。）

要開闢全新的市場真是談何容易，而且涉及的風險十分之高。尤有甚者，任何創新也很易引來模仿者，因此優勢往往只能維持一時。（這正是為甚麼我們要有「專利權」制度。）對大部分企業來說，要提高利潤率（或防止利潤率下降），更為

現實的辦法是減低成本。

我們知道，生產的主要成本來自土地、資金和勞動力（land, capital, labour）這三大「生產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這兒的「資金」既包括了購買原材料所需的金錢，也包括了廠房和機器等固定資產。）要「降低成本」的話，一是降低這些「生產要素」的價格，二是提升它們的「生產力」（productivity）。

讓我們先看看這些「生產要素」的「價格」：土地的價格是「地租」（rent）；資金的價格是跟銀行借錢後，還款時要支付的「利息」（interest），以及廠房和機器等的「折舊」（depreciation）；而勞動力的價格則是「工資」（wage）。可以看出，要減低這種種支出真是談何容易！事實上，地租和利息都不是企業所能夠改變的。惟一較能改變的，是工人的工資水平。但問題是，工資水平某一程度上也是由勞動市場的供、求所決定（除非我們有一支「後備失業大軍」）。無論僱主怎麼「無良」，如果他把水平定得過低，不但無法請得所需的人，就是原有的工人也會「另謀高就」。

這便把我們帶到「提升生產力」這個核心意念之上。透過了不斷的技術革新，所有企業都努力地把它生產力逐步提升。而無論是「資本」（如機器）生產力的提升（如每部機器每天能夠生產的價值），還是「勞動」生產力的提升（如每個工人 — 往往亦是透過機器的幫助 — 每天能夠生產的價值），其結果都是生產所需的人手將不斷減少。

這對企業來說這當然是大大的好事，因為工資是生產成本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但對工人及至整個社會來說，這卻是一件大大的壞事。失業不單影響工人的生計，也影響到家庭的和諧及至社會的穩定。還有我們不要忘記的是，工人既是社會上的「製造者」（producer），同時也是社會上最重要（因人數最多）的「消費者」（consumer），因此廣大群眾如果因失業而消費銳減，勢必影響企業的營運，最後甚至出現生產過剩、企業倒閉和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

### 「經濟列車」的秘密

既然如此，我們這輛「經濟列車」不是一早便應該出現嚴重的危機了麼？問得好！事實是，過去數百年來，先是在西方，後則遍及全世界，經濟危機確是一浪接一浪的不絕如縷。景氣、衰退、復甦、景氣…的「經濟周期」已經成為了現代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特徵。但事實也是，迄今為止，這些危機未有令世界的經濟全面崩潰。相反，世界的經濟仍不斷發展，我們每次都能夠從危機之中恢復過來，而且比之前更為強勁。如果我們問：「人類歷史上哪個時刻最為富有？」每一天的答案都是：「就是今天！」

秘密在哪裡呢？就在「經濟增長」這隻「現代聖牛」之上。

企業競爭導致技術革新、技術革新導致人手縮減、人手縮減導致失業和消費下降、消費下降導引生產過剩和企業萎縮…。然而，只要經濟的總體規模不斷增長，上述這個「矛盾」便可以不斷被「掩蓋」。相反，經濟一旦停止增長，上述的矛盾便會即時顯現而導致災難。這便是「經濟增長」作為一股「不可抗力」背後的「硬道理」。

這個「硬道理」背後其實還有一個金融世界的「內在邏輯」。不少人指「企業必須以盈利為最高目標」這個原則，是導致企業不少「反社會行為」的罪魁禍首，是一種十分狹隘的「企業觀」。（而「社會企業」的推動正是抗衡這種「病態」趨勢的努力。）但他們可能沒有想過：（1）「利潤掛帥」的邏輯就是「銀行存貸」（嚴格來說是「存、貸利息差」）的邏輯：如果企業盈利不足，便根本沒有可能支付銀行貸款的利息，更不用說可以健康茁長；（2）只要盈利下降，股民便會頭也不回地拋棄這間企業的股票，至令這間企業的融資甚至資金周轉都會出現問題。

這樣看來，無論是企業的不斷膨脹（「做大做強」是硬道理！）還是整體經濟的不斷增長（GDP 保持強勁增長；如溫總於零八金融海嘯後呼籲的「保八」），都是「人（類）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一種境況。那便好像很多人所作的比喻（雖然沒有科學根據）：我們必須像鯊魚一樣不停地向前游，只要一停下來便會死掉。

如此看來，「經濟增長」這頭「聖牛」其實更似一頭猛虎。全人類現在真箇是「騎虎難下」。

以上是從「產消循環」（production-consumption cycle，簡稱 pro-sumption cycle）這個角度所作的學理分析。但「騎虎難下」的邏輯，背後還包括「貧富懸殊擴大」和「貪污腐敗猖獗」這兩大層面。不用說，這兩種情況都廣泛地存在於現今地球上不少國家之中。但只要這些國家的整體經濟仍在不斷增長，人們仍然“有錢賺”甚至寄望可以“一朝發達”，則他們大至仍可免強忍受這些巨大的不公義。但一旦經濟停止增長（甚至只是增長放緩），所有這些社會矛盾便會如火山般爆發。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增長」已經成為了既得利益階層和當權者的「最後法寶」甚至「救命草」。

至此，我們應該明白「經濟增長」這個「硬道理」實在有「多硬」；或是這個「不可抗力」究竟如何的「不可抗拒」吧！

但另一方面，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事實俱在、鐵證如山」，在大自然的物理極限

這個「不動體」之前，這個「不可抗力」便等於一隻雞蛋般脆弱！

### 「不動體」— 一個被忽略了的主角

無可逃避的結論是（英語中的所謂“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即使我們不盡快大力扭轉人類現時的發展方向，大自然的極限 — 包括各種原料的短缺、水源短缺、石油耗盡、全球暖化、天氣反常、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環境污染、土壤破壞、生態崩潰、糧食短缺、瘟疫蔓延…等，也很快（不少學者的估計是不出本世紀中葉）便會令人類的社會作出根本性的改變。

關鍵當然在於，上述的轉變是「主動」還是「被動」地作出將有很大的分別。如果是主動的，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智慧把衝擊減至最少。（雖然不少學者指出，就是最少的衝擊，也會相當於美國或英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推行的「戰時措施」。一些學者更已開始積極地研究這類措施的可行性和社會影響。）

相反來說，如果我們一直採取「駝鳥政策」而漠視現實，當假的「不可抗力」迎頭撞向真的「不動體」時，結果將會是災難性的。到了這時，人類社會當然會作出轉變，但這種「被動」的改變不啻等於一場浩劫。相比起來，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將會是「小巫見大巫」。

這兒有一個好消息和壞消息。好消息是基於「零增長繁榮」（Zero-Growth Prosperity）的「後增長文明」（post-growth civilization）雖然短期內會帶來一定的不便甚至“痛苦”（端視乎你對物質追求的程度而定），但長遠來說卻很可能為人類帶來更大的快樂和滿足。（事實上，眾多的社會心理學研究顯示，過了某個水平之後，更多的消費不會帶來更多的快樂，甚至會適得其反… 留意這兒的「增長」只限於經濟的層面（economic growth），而沒有包括可以繼續不斷向前的「社會發展」— social growth。）

而壞消息則是，這種轉變必然會遇到極其巨大的阻力。

這股阻力將會來自三方面：利益上的、認識上的，和本能上的。讓我們從最後一點說起。所謂本能上，是指絕大部分人都有一種習慣上的惰性而害怕轉變，他們對前所未見的事物都會滿懷恐懼，而「零增長繁榮」當然便是這樣一種「前所未見」（也是「離經叛道」）的事物。要克服這種阻力，惟一的辦法是令他們充份認識到「不變」的嚴重後果。這便把我們帶到「認識」的層面。

認識上的阻力不用說主要來自經濟學家。經濟學家的論據主要有三：第一是再三重申上述有關經濟增長的硬道理，亦即「經濟停止增長將導致文明崩潰」。第二

是指出在市場的引導和人類聰明才智的作用下，任何資源的短缺都會導致「代用品」的發明，因此所謂「自然極限」只是一種杞人憂天的危言聳聽。第三是強調「消除貧窮和環境污染」的「最佳辦法」是「更多的經濟增長」而非「更少的增長」。而當我們的財富增長至今天的十倍或者二十倍時，解決貧窮和環境問題將是十分容易的一回事。

筆者不打算逐一駁斥上述的論點。因為只要我們睜開眼睛看看世界過去這數十年的發展，以及此刻每天都在地球上發出的事情和它們的總體趨勢，我們當會看出上述的第二和第三體是如何的脫離現實和自欺欺人。為甚麼我故意沒有提第一點呢？這是因為第一點正是本文的主旨，我們往後還會進一步探討。

在某一程度而言，我是頗為同情經濟學家的。這是因為在他們的專業訓練中，從來也沒有包括對「自然極限」這個「不動體」的認識和研究。如今竟然由一些「外行」（即非「經濟學專業」）的人來告訴他們：他們一直所支持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如何的「不可持續」。任何人面對這種情況都會有一種不服氣甚至「被出賣」的感覺。（當然，也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有如此的反應。一些思想深刻並且具有宏觀視野的經濟學家 — 包括曾獲諾貝爾獎的 Kenneth Boulding、Amartya Sen 和 Joseph Stiglitz 等 — 都已深深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並嘗試為人類尋找更好的出路。）

但我們真的要是地球科學家或是生態學家，才可了解「自然極限」這個「不動體」是如何不可逾越嗎？答案是否定的。我們需要明白的，只是宇宙間一個最簡單的原理：複式增長。

## 複式增長的威力

經濟學家當然知道我們所說的「GDP 增長」是一種複式增長，但他們絕少會（還是從來不會？）把這種增長的作用推至其邏輯的結論。

我們最常用以表示「複式增長快慢」的指標是「年增長率」(annual growth rate)，例如「零八金融海嘯」之後，溫家寶總理提出了「保八」的目標，就是要把中國的經濟增長保持在每年 8% 或以上。但令我們能夠真正充份了解這種增長威力的其實不是「年增長率」，而是「倍增期」(doubling period)，亦即某一事物在數量上翻一番所需的時間。以嚴謹的數學公式從「年增長率」求出「倍增期」絕不困難，但更易的一個約算方法，是用「年增長率」來除 0.72 這個數字。再以溫總的「保八」政策為例，把 0.72 除以 0.08，答案是 9，亦即我國的 GDP 每九年便會「翻一番」。

這意味著甚麼呢？在每九年便增加一倍的情況下，這意味到了本世紀中葉，我國經濟的整體規模 — 以及由此而引至的物資消耗（請想想鋼鐵和木材）、能源消耗、廢物產生、二氧化碳排放、生態破壞、環境污染 — 等，將較今天（二零一一年中）的大上 32 倍；而至本世紀末下世紀初，將會大上一千倍！（不信嗎？請看看：第一個九年是兩倍、第二個九年是 4 倍、第三個九年是 8 倍、第四個九年是 16 倍、第五個九年是 32 倍、第六個九年是 64 倍、第七個九年是 128 倍、第八個九年是 256 倍、第十個九年是 512 倍、第十一個九年（即 99 年後 的 2110 年）是 1024。）無怪乎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宇宙間威力最大的是複式增長。」

「年增長率八個巴仙確實是高了點。這只是一個較短期的目標，沒有人預計它會持續一百年…」你可能會這樣回答。好！那麼請你回答：（1）你認為這樣的增長應該持續多久呢？（2）你認為長遠來說，一個怎樣的增長率才算合理呢？

在你未想到一個滿意的回答之前，讓我們看看美國這個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

美國的人口只是中國的五分一多一點，但 GDP 是中國的兩倍半，物資與能源的消耗長期處於世界之冠。（例如她的二氧化碳排放便佔了全世界近四分之一。）「零八金融海嘯」之後她爭取保持 3% 的經濟增長。任何熟悉財經的人都會同意，3% 乃是一個頗低的數字。好了，讓我們看看這又意味著甚麼。

在每年 3% 的複式增長底下，倍增期是 24 年不到。就讓我們採用 24 年來作計算，那便表示到了 2059 年（兩個倍增期後），美國整體的經濟規模會較今天的大 4 倍；而到了 2083 年，規模更會達至今天的 8 倍。你可以想象美國的經濟規模是今天 8 倍之時是怎樣一翻景象嗎？（曾經在美國居住一般時間的人當會有更深刻的感受。）

我們還未有考慮人口已達 12 億而 GDP 年增長率達 7.5% 的印度，以及其餘三十多億正在努力改善他們生活質素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呢！

### 來自「透支」的繁榮

一九七二年，一群學者就工業文明發展的自然極限作出了一趟全面的考察，並指出這些極限將於數十至一百年內令文明發展觸礁。這當然便是著名的「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所發表的《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報告。數十年來，這份報告被經濟學家不斷嘲笑和嗤之以鼻。然而，踏進了廿一世紀，有見全球生態環境急速惡化，聯合國召集了過千個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為人類迄今對地球的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了一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二零零五年，這項名為「千禧生態系統評估」（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的計劃

發表了總結報告。這份報告證實了不少人多年來的憂慮，因為研究顯示，無論就全球的土壤、森林、草原、海洋、沿岸生態、山區生態、極地生態、淡水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等各個方面，人類活動的影響，皆已超出了自然界可以自我更新復元的「總負荷量」(total carrying capacity)，其中一些更超出了達百分之五十之多。（雖然報告並不以此為重點，但其中最明顯的「超載」是二氧化碳的排放：現時人類排放的每噸二氧化碳之中，至少有半噸已經無法被大自然的循環所移除而在大氣層內累積起來。而人類如今每年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達十億噸，而且仍在不斷增加……。）

還記得我們在上文中曾經提到：要數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一刻，答案必然是「就在今天」嗎？如今我們看得更清楚了。按照一些學者的推算，如果把人類對自然環境所作的巨大破壞計算進去，過去數十年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個負數。用理財的術語來說，我們已經在「透支」並在賒借度日。

在這樣的背景下，請大家嘗試想象全球的 GDP 是今天的兩倍、四倍、八倍……時，世界將會出現怎樣的景象。

有人可能會說，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我們在增加同等數量 GDP 時所使用的物資和能量（以及所製造的污染和廢料）可能會大幅下降也說不定。老實說，筆者其實是一個「科技擁護者」，因此對這個說法絕無懷疑，問題在於有關的幅度和速度。不要忘記我們面對的是複式增長。在每年 8% 的增長率底下，我國的 GDP 到了 2056 年將是今天的 32 倍。你能夠想象到了那時，在提升 GDP 同一個百分點之時，我們只需使用今天的物資和能量的 32 分之一嗎？（在二零零九年的「哥本哈根國際氣候會議」中，中國的「減排承諾」是至二零二零年，把每單位 GDP 增長所導致的碳排放量由二零零五的水平減少 40-45%……。）

撇開「保八」這個高指標，假設全球在廿一世紀期間都只是以 3% 的速率增長，則全球經濟規模到了 2080 年左右仍會較今天的大 8 倍。「已經超過總負荷量 50%」和「將較今天的規模大 8 倍」這兩者之間的鴻溝如何彌合？我們真的可以在這七十年間把導致同一 GDP 增長的物資和能量消耗較今天的減至八分之一或更低嗎？

至今大家應該明白，為甚麼不少科學家都估計，到了本世紀中葉，人類這輛「經濟增長列車」將與大自然這個「不動體」迎頭相撞。而要避免「車毀人亡」的話，我們必須立刻便要改變列車的方向，任何延遲都會好像「鐵達尼號」猛然發覺冰山橫互在前一樣，即使全速轉向也為時已晚。

一些經濟學家也許會嚴肅而鄭重的指出，在全球數以十億計的人仍然處於貧困和



匱乏之時（世界銀行 2008 年的數據顯示，全球每天只能靠不足 2 美元生活的人口達 27 億；而只能靠不足 1.25 美元生活的也達 14 億…），提出甚麼「零增長繁榮」或「後增長時代」是一種有違人道、不負責任、脫離現實的「象牙塔式」呼籲。

筆者完全認同這項批評。但提出批評的人有所不知的是，他們這項批評不但沒有否定我的論點，反而大大加強了我的論點！

請細心的想一想：世界確實存在「經濟過度發展」和「經濟發展不足」的嚴重矛盾。後者的國家當然應該繼續發展經濟以改善民生。但在「不動體邏輯」之下，這只能導致兩個結論：（1）「經濟發展過度」的國家必須更快地達至「零增長」（進一步的做法是把財富與更需要的人們共享）；（2）發展中國家必須找出新的經濟發展道路，而絕對不能重蹈發達國家的「高消耗、高污染」的覆轍。事實上，只有結合了（1）和（2），我們才有機會把列車及時轉向，而不至高速撞在峭壁之上。

我說過阻力會來自「本能」、「認識」和「利益」這三方面。上述的分析只是觸及了頭兩者。至於來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對不起！筆者對此沒有甚麼靈丹妙藥。我惟一能夠做的，仍然是從「認識」的層面出發，指出在一個氣候惡劣、生態崩潰和充滿仇恨和動盪的世界裡，富人也不見得會怎樣好過。不錯，他們可以住在重門深鎖的堡壘式大宅之中，並聘請僱傭兵來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但這真是他們願意見到的世界嗎？

我們自小便學到「人生的要義在於分享」這個道理，但在現實中，只要有人提出「社會財富的分享」（例如提升富人的稅率，或增加企業的盈利稅等），卻會立刻引來一些人大喊「專制共產主義幽靈的復活」。究其原因，是這些人把「共享繁榮」和「極權專制」不自覺地等同起來了。事實上，「民主、自由」和「資源共享」在原則上並無牴觸之處，最重要是這種「共享」是透過民主的程序 — 而非專制的政權 — 所建立起來的。

### 呼喚經濟學家的「拆彈雄心」

好了，我們終於到了本文最關鍵之處，那便是：如何才可以扭轉「經濟停止增長將導致文明崩潰」這個「不可抗力」的「內在邏輯」呢？接著的問題是：誰人最有條件、最有資格和最有責任去尋找和提出有關的答案？毋庸置疑，我認為必定是經濟學家。但問題是：現今世界的經濟學家中，有多少個願意肩負起這個責任？

過去數十年來，一些人確實不懈地作出了努力，可惜他們都被主流經濟學所忽

視、漠視而「邊緣化」。早於一九七三年，經濟學家 Herman E. Day 已編了一本名稱叫 *Towards a Steady-State Economy* (邁向恆穩態的經濟學) 的學術文集。但這在當時儼然是一種「荒野中的呼喚」。較為人所熟知的，是學者 E.F. Schumacher 於

一九七五年出版的經典之作《小是美的》(*Small Is Beautiful –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書中指出傳統的經濟學過於著重物質財富的增長，而忽略了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這一振聾發聵的批評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但不用說，主流經濟學對這本書是一笑置之，並視之為一個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者的夢囈。數十年轉眼過去，眼見全球環境不斷惡化，愈來愈多學者開始更具體地反思人類經濟發展的方向應該為何。其中較重要的著作包括：

- *Beyond Growth* (1996) 作者 Herman E. Daly;
- *Cannibals With Forks* (1998) 作者 John Elkington;
- *Natural Capitalism* (1999) 作者 Paul Hawken, Amory & Hunter Lovins;
- *Cradle to Cradle* (2002) 作者 Michael Braungart;
-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3) Herman E. Daly;
- *Deep Economy* (2007) 作者 Bill McKibben;
- *The Constant Economy* (2009) 作者 Zac Goldsmith

上述的著作雖然都十分富於見地和擲地有聲，但就筆者所見，把問題真正帶至其邏輯結論，從而高調地提出「零增長繁榮」和「財富共享」這些大膽意念的，還有待近這數年才出版的兩本書：由 Tim Jackson 於 2009 年出版的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及由 Paul Gilding 於 2011 年出版的 *The Great Disruption*。筆者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乃受到這兩本書的啟發。但問題是，即使這兩本書也主要限於解說「經濟增長不可持續」背後的「不動體邏輯」，而未有深入細致地分析和拆解「經濟增長」作為一股「不可抗力」背後的「內在邏輯」。而事實是，一日這個「內在邏輯」未被拆解，「停止增長」的呼籲也會一日被看成為一種「環保恐怖主義」。

這種「拆解」當然是一項十分巨大而艱辛的工作，卻也是廿一世紀經濟學的首要任務。筆者在此懇切地呼籲：全世界的經濟學家應該本著「拆彈雄心」，為這個影響人類前途的奮鬥作出貢獻。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